

文學遺產

增刊

第十一輯

文學遺產增刊十一輯

《文學遺產》編輯部編

中華書局

文學遺產增刊十一輯

《文學遺產》編輯部編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明莊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民族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850×1168毫米 1/32·55/8印張·128,000字

1962年10月第1版

1962年10月北：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5,500 定價 (9) 0.80元

統一書號 10018·337 62, 9, 京型

目次

從《文心雕龍·原道·序志》兩篇看劉勰的思想·····	楊明照 (1)
關於劉勰的“三準”論·····	郭味農 (13)
關於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品》的異同·····	文 銓 (20)
論風骨·····	李樹爾 (29)
關於《文心雕龍·風骨篇》的“骨”字 ·····	潘 辰 (38)
劉勰對文章風格的要求·····	俞元桂 (43)
也談《從漢代關於屈原的論爭到劉勰的辨騷》·····	王達津 (48)
對劉勰世界觀問題的商榷·····	曹道衡 (53)
《文心雕龍》的批評論·····	佩 之 (57)
《知音》初探——《文心雕龍》札記·····	黃展人 (66)

* * *

略論阮籍及其《詠懷詩》·····	張志岳 (73)
談梅堯臣詩歌題材、風格的多樣性 ·····	霍松林 (94)
讀《遺山樂府》·····	沈祖棻 (111)
略談吳梅村的七言古詩及其《蕭史青門曲》·····	馬鈴娜 (120)
《唐詩選》注解的商榷·····	盛靜霞 蔣禮鴻 (130)

* * *

范成大佚文的輯集與繫年·····	徐 甫 (139)
王沂孫出仕及生卒年歲問題的探索·····	常國武 (159)
從兩部詩集裏所見到的有關吳敬梓的資料·····	汪蔚林 (166)

從《文心雕龍·原道·序志》兩篇

看劉勰的思想

楊明照

探討劉勰的思想，對《文心雕龍》的理解極有幫助，也非常必要。有關這方面的論述，散見於各種書刊上的已不少了。見仁見智，雖然還有較大的分歧；但討論越來越深入，分析越來越細緻，却是十分可喜的現象。不賢識小，擬先就《原道》《序志》兩篇作初步的試探。縱有陽春難和之感，還是不自藏拙地把它寫出來，向讀者請教。

《原道》是《文心雕龍》的開宗明義第一章，《序志》是“以馭羣篇”的總序。要了解劉勰的思想和文學觀，這兩篇極其重要，所以選為主要的考索對象。為了便於說明，又先從《序志》篇着手。

《文心雕龍》以《序志》殿後，跟《淮南子》的《要略》、《史記》的《自序》一類的篇目有同樣的意義和作用，是全書最關緊要的一篇。劉勰在篇裏強調了著作的重要，說明了撰述的緣起，簡介了全書的內容和義例，也寄託了無限的“長懷”。這對探討劉勰的思想和《文心雕龍》，的確有莫大的便利，也是最可寶貴的資料。可是，有的同志在論證劉勰的思想時，取材於《滅惑論》的地方反而比這篇得多，甚至還有隻字未提的，似乎不怎麼恰當。

劉勰爲什麼要寫作《文心雕龍》這樣一部巨著呢？《序志》篇曾有所說明：

夫宇宙綿邈，黎獻紛雜，拔萃出類，智術而已。歲月飄忽，性靈不居，騰聲飛實，制作而已。夫有肖貌天地，稟性五才，擬耳目於日月，方聲氣乎風雷，其超出萬物，亦已靈矣。形同草木之脆，名踰金石之堅。是以君子處世，樹德建言，豈好辯哉？不得已也！

可見劉勰想通過著作來留身後之名，是蓄意已久，立志甚堅的。《諸子》篇也有類似的話句：

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百姓之羣居，苦紛雜而莫顯，君子之處世，疾名德之不章。唯英才特達，則炳曜垂文，騰其姓氏，懸諸日月焉。……嗟夫！身與時舛，志共道申，標心於萬古之上，而送懷於千載之下。金石靡矣！聲其銷乎？

這裏表面上雖在談諸子，實際無異於自白。特別是《序志》篇末的“茫茫往代，既沈子間，眇眇來世，倘塵彼觀”，與《諸子》篇的“標心於萬古之上，而送懷於千載之下”，寓意大體相同。《序志》篇贊文的最後兩句：“文果載心，余心有寄。”更可以看出劉勰對於所謂“踰金石之堅”的名，是何等地重視！像這樣地熱中於名，當然不始於劉勰，而是儒家一貫重視的問題。從孔子開始，就再三強調名的重要：

子曰：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！四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（《論語·子罕》篇）

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篇）

子曰：……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（《孝經·開宗明義章》）

孔子對名這樣重視(假如要再往上推,則以叔孫豹所論的“三不朽”為最早,見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四年),顯然是與佛家的反對“名聞利養”大相逕庭的。那麼,劉勰在寫作《文心雕龍》時的主導思想就不是把“名聞”看空了的佛家思想,而是受了孔子的影響的儒家思想了。由於劉勰圖名的思想很濃厚,因而當他的《文心雕龍》寫成,還“未為時流所稱”的時候,竟採取了“負書候(沈)約於車前”(並見《梁書·劉勰傳》)的行動,希望得到一代文宗的游揚,有利於他的“騰聲飛實”,使其“名踰金石之堅”。好名到了這種程度,絕不是一個真正“無我”的人所干的吧。有的同志認為劉勰“並不曾把這部書當為最重要的作品”。看來是與事實不符合的。

著述的方面本很廣闊,劉勰何以只從事於“論文”呢?這可能與他的迷信觀點有關。《序志》篇曾記載了他所認為的兩個奇異的夢,第一個夢是:

予生七齡,乃夢彩雲若錦,則攀而採之。

做夢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,今天更沒有把古人所迷信的東西再提出來談的必要。不過,古代却是很迷信它的。被儒家奉為經典的《書》《詩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等,都有關於夢的記載,《周禮》且列有專官——占夢。就是六朝的人們,又何嘗不迷信夢哩。如謝靈運因夢見謝惠連即成佳句(見鍾嶸《詩品》中引《謝氏家錄》及《南史·謝方明傳》),江淹因夢張載索錦(見《南史·江淹傳》)、郭璞索筆(見《詩品》中及《南史·江淹傳》)而“才盡”的傳說,不是都形諸筆端,為以往文人所習用的典故嗎?當然,我不是替劉勰作占夢,在宣揚迷信,而是為了說明劉勰的迷信。尤其是劉勰夢彩雲若錦與江淹夢索錦的“錦”,恐怕還有當時的迷信看法在。劉勰之所以要大書特書,無非表示他少小即與文學有緣分。不然的話,這件事夾敘其間,就不

容易理解他的用意所在了。

劉勰對夢既很深信，所以他又帶着驚訝而欣慰的語氣說出所做的第二個夢：

齒在踰立，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；旦而寤，適怡然而喜。大哉，聖人之難見也！乃小子之垂夢歟？自生人以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

真巧，劉勰所夢着的孔子，原來也是有夢癖的：

子曰：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。（《論語·述而》篇）

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，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。（《呂氏春秋·博志》篇）

儒家的聖人對夢都這樣感興趣，難怪劉勰因夢隨孔子而感到興奮，要“怡然而喜”了。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：孔子所夢見的文王周公，是儒家稱為的聖人；而劉勰所夢隨的孔子，則是“自生人以來未有”的聖人。從劉勰的“依沙門僧祐”很久而又“博通經論”（並見《梁書·劉勰傳》）的情況來說，為什麼不像劉莊那樣夢見“天竺得道者”的佛“飛在殿前”（見《牟子·理惑論》）？所夢隨的偏偏是中國古代的聖人孔子，並且還“執丹漆之禮器”隨着“南行”呢？這也是在表示他對孔子的嚮往。難道劉勰的儒家思想還不够濃厚嗎？

恭維孔子為“自生民以來未有”的聖人，出自孔門弟子有若、子貢之口（見《孟子·公孫丑》上篇），原無足奇。劉勰因一夢之故，一則曰：“大哉，聖人之難見也！”再則曰：“自生人以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”對孔子這樣崇拜，比在《滅惑論》中稱揚釋迦實有過之無不及。《原道》《徵聖》《宗經》等篇，尤為推崇備至。其儒家思想之濃厚，更可概見。

上文曾說，劉勰是醉心於名山事業的。那他考慮著述時，勢必

要從能否“立家”方面着想。“敷讀聖旨”，雖然他也知道以“注經”爲最好，但“馬鄭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”，只得放棄。認爲，“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。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”。而當時的“文體解散”，“將遂訛濫”，又是由於“去聖久遠”，“離本彌甚”。所以他“擲筆和墨，乃始論文”（以上引文並見《序志》篇）。在劉勰看來，“注經”與“論文”都屬於“敷讀聖旨”，是殊途同歸的。同時，他把文章與經書的關係說得那麼深湛，把聖人與經書的功能說得那麼偉大，是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以來各家文論中不曾有過的說法。這又足以說明劉勰從事《文心雕龍》的寫作，是由於他那濃厚的儒家思想所指使。

正因爲劉勰的儒家思想濃厚，單是他在《序志》篇裏所表現的，無往而不從聖人和經書出發。上面提過的不說了，我們再看：“蓋《周書》論辭，貴乎體要，尼父陳訓，惡乎異端”。不是稱引起來說明他要寫出一部“辭訓之異，宜體於要”的文論嗎？“蓋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”。不是把它們作爲“文之樞紐”來強調《原道》《徵聖》《宗經》三篇的重要嗎？就是在全書的篇章組織上，也要說出“位理定名，彰乎大易（衍）之數，其爲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”一番大道理來。這還是由於受了《周易·繫辭》的影響使然。此外如批評以前的文論爲“不述先哲之誥”，就是說明他的《文心雕龍》是要“述先哲之誥”。事實也正是這樣，“先哲之誥”，是貫注着全書的。

從以上簡單分析中，很清楚地看出劉勰在《序志》篇裏所表現的思想確爲儒家思想。

二

古人著書以“原道”二字名篇，前於劉勰的，有漢代的劉安，後

於劉勰的，有唐代的韓愈（清代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裏也有《原道》上中下三篇）。他們的標題雖然相同，涵義却各有所指。劉安所原之道，是道家之“道”；韓愈所原之道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“道”。而劉勰所原之道，則為自然之“道”。關於這點，黃侃先生的《文心雕龍札記》曾有簡要的詮釋：

《序志》篇云：“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。”案彥和之意，以為文章本由自然生，故篇中數言“自然”：一則曰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”；再則曰“夫豈外飾？蓋自然耳”；三則曰“誰其尸之？亦神理而已”。尋釋其旨，甚為平易。蓋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語；既有言語，即有文章。言語以表思心，文章以代言語，惟聖人為能盡文之妙。所謂“道”者，如此而已。
(1947年四川大學中國文學系排印本第一頁)

這個說法，基本上我是同意的。

什麼是自然之道呢？劉勰在《原道》篇裏把它概括為天文地文人文三個方面，並分別予以說明：

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，日月疊璧，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。此蓋道之文也。

這裏的“道”字，即自然二字的意思。所謂“道之文”，就是自然之文。這種自然之文，在劉勰看來，不只是天上的日月，地下的山川才有。其它的“萬品”，如龍、鳳、虎、豹、雲霞、草木，以及林籟、泉石等“無識之物”也一樣地有：

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；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妙；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。夫豈外飾？蓋自然耳。至於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鐘。故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。

宇宙間的一切既然都各有其文，作為“三才”之一的人，是“有心之器”，當然也是有文的：

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。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。惟人參之，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。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；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

天、地、人的自然之文，與文學究竟有什麼關係呢？劉勰認為，在八卦和文字還未出現之前，天文地文和人文雖然早已存在，卻沒有工具將它們寫下來。從庖犧畫八卦和文字發明以後，歷代的聖人才先後寫成書面的東西，這便是《六經》。所以他在篇末說：“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。”“道”既然是通過聖人才寫成“文”，而聖人又是通過他們的“文”來闡明“道”，因而《六經》就成為“旁通而無滯（涯），日用而不匱”的“道之文”。劉勰主張文原於“道”的出發點在這裏，接二連三地提出“征聖”“宗經”的原因也在這裏。

現在要進一步問：文原於“道”的論點是劉勰的創見嗎？個人不成熟的看法，它是來源於《周易》。理由是，篇中除屢用《周易》的辭句和一再提到有關《周易》的故實外，如“麗天之象”、“理地之形”、“高卑定位，兩儀既生”、“觀天文以極變，察人文以成化”之類，都是《周易》上面的說法，其它的經書是不經見的。只不過劉勰有所發展罷了。其實，王充的《論衡》已有了這樣兩句：

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，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。（今本佚，此據《意林》卷三引）

劉勰把日月山川看作天地自然之文，可能是受了王充的影響的。後來白居易《與元九書》中所說的：

夫文尚矣，三才各有文；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；人之

文，《六經》首之。

則又本於劉勰。歸根到底，都是由《周易》演繹而來。

這裏還須說明，劉勰本是強調“宗經”的，經書非一，何以《原道》篇的論點只來源於《周易》呢？個人的看法這樣：《六經》中談哲理的，只有《周易》（《法言·寡見》篇：“說天者莫辯乎《易》。”就是指這層說的）；談有關“文”的問題的（當然是最廣義的“文”），也以《周易》為最多。同時，《周易》又是被歷代儒家學者認為最古而又最重要的一部經典。所以劉勰在第二大段裏即側重於《周易》方面的論述。因為他要暢談“人文”，所涉及的“太極”、“八卦”、“十翼”、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、“文言”、“繇辭”等，別的經書是無所取材的啊。

文原於“道”，是劉勰對文學的根本看法，也是全書的要旨所在。篇中的論點既然出自《周易》，而《周易》又是儒家學派的著作，從總的傾向來看，劉勰寫作《文心雕龍》時的主導思想應該是儒家思想。下面擬再從別的方面來證明：

第一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稱《易》為“人更三聖”，“三聖”即伏羲、文王和孔子，這是儒家學者相承的舊說。劉勰所論述的“人文”，於庖犧（即伏羲）的畫卦，文王的繇辭，孔子的十翼，都有所稱道，與儒家學者的舊說合。

第二，在儒家所稱美的歷代聖人中，對周公孔子尤其是孔子特別推崇，為《徵聖》《宗經》兩篇張本。

第三，稱唐虞文章為“煥乎為盛”，說商周為“文勝其質”，都是重述孔子的說法（前者見《論語·泰伯》篇，後者見《禮記·表記》篇）。

第四，“聖因文而明道”句，尋繹上下文意，確系指儒家聖人在經典中所闡明的“道”。《宗經》篇“經也者，恆久之至道”的“至道”，《雜文》篇“唯《七屬》紱賢，歸以儒道”的“儒道”，《史傳》篇“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”的“王道”，《總術》篇“常道曰經”的“常道”與這裏

“明道”的“道”是同一範疇，都屬於儒家之道。有的同志認為“《原道》篇中所說的“道”，也不是儒家的道和道家的道，而是“佛道”的“道”。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。

第五，儒家一貫重視的“仁”和“孝”，劉勰不僅在贊中明朗提出——“炳燿仁孝”；就是評論某些作家作品時，也是以“仁”“孝”作為一種尺度的。如《諸子》篇之於商鞅韓非：

至如商韓，六蝨五蠹，棄孝廢仁，輟藥之禍，非虛至也。

《程器》篇之於黃香：

黃香之淳孝。

《指瑕》篇之於左思的《七諷》：

左思《七諷》，說孝而不從。反道若斯，余不足觀矣。

都有明文可驗。《祝盟》篇論“盟之大體”，還是以“獎忠孝”為其主要內容之一。

把上面所論列的聯繫起來看，劉勰在《原道》篇裏所表現的思想，也只能說是儒家思想。

三

就《原道》《序志》兩篇推定劉勰寫作《文心雕龍》時的主導思想為儒家思想，已如上述。其它各篇是不是相同的呢？個人認為一樣地是儒家思想。《徵聖》《宗經》兩篇，彰明較著地是儒家思想用不着征引了。這裏只將別的篇裏有關的辭句附帶抄錄如下：

《正緯》篇：經顯，聖訓也。經足訓矣，緯何豫焉；

《辨騷》篇：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？故其陳堯舜之耿介，稱湯武之祇敬，典誥之體也。至於託雲龍，說迂怪，……摘此四事，異乎經典者也。雖取鎔經意，亦自鑄偉辭。

《銘箴》篇：則先聖鑒戒，其來久矣。

《雜文》篇：唯《七屬》敘賢，歸以儒道；雖文非拔羣，而意實卓爾矣。

《史傳》篇：言經則《尚書》，事經則《春秋》。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。實聖文之羽翮，記笈之冠冕也。法孔題經，則文非元聖。至於宗經矩聖之典。班史立紀，違經失實。是立義選言，宜依經以樹則；勸戒與奪，必附聖以居宗。若乃尊賢隱諱，固尼父之聖旨。

《諸子》篇：聖賢並世，而經子異流矣。孟軻齊儒以磬折。述道言志，枝條《五經》。夫自六國以前，去聖未遠，故能越世高談，自開戶牖。

《論說》篇：聖哲彝訓曰經，述經敘理曰論。論者，倫也。倫理無爽，則聖意不墜。至石渠論藝，白虎講聚，述聖通經，論家之正體也。

《詔策》篇：並本經典以立名目。武帝崇儒，選言弘奧，策封三王，文同訓典。

《奏啓》篇：秉儒家之文。

《議對》篇：議貴節制，經典之體也。故其大體所資，必樞紐經典。

《體性》篇：典雅者，鎔式經誥，方軌儒門者也。

《風骨》篇：昔潘岳錫魏，思摹經典，羣才韜筆。若夫鎔鑄經典之範。

《通變》篇：矯訛翻淺，還宗經誥。

《定勢》篇：是以模經爲式者，自入典雅之懿。

《情采》篇：聖賢書辭，總稱文章，非采而何？

《麗辭》篇：《易》之《文》《繫》，聖人之妙思也。

《事類》篇：然則明理引乎成辭，征義舉乎人事，迺聖賢之鴻模，經笈之通矩也。夫經典沉深，載籍浩瀚，實羣言之奧區，而才思之神臯也。經書爲文士所擇。經籍深富，辭理遐互。

《練字》篇：史之闕文，聖人所慎。

《總術》篇：常道曰經。分(六)經以典奧爲不刊。

《時序》篇：遠孝武崇儒，潤色鴻業，禮樂爭輝，辭藻競薦。及明帝疊耀，崇愛儒術，肆禮璧堂，講文虎觀。然中興之后，羣才稍改前轍，華實所附，斟酌經辭。蓋歷政講聚，故漸靡儒風者也。

《才略》篇：商周之世，則仲虺垂誥，伊尹敷訓，吉甫之徒，並述詩頌。義固爲經，文亦師矣。荀況學宗，而象物名賦，文質相稱，故巨儒之情也。馬融鴻儒，思洽識高，吐納經範，華實相扶。潘岳憑經以聘才，故絕羣於錫命。

上列辭句裏的“經”、“經典”、“經誥”、“典誥”，“儒”、“儒道”、“儒門”、“儒術”，“聖”、“聖哲”、“聖旨”、“聖意”等，不管從字面上或內容上看，都是指儒家的經書、學說和聖人而言；所稱的“夫子”、“元聖”、“尼父”，則明明是指的孔子。《序志》篇提出的“先哲之誥”，大概就包有這些在內的吧。此外如品評《楚辭》的“典誥”與“夸誕”（見《辨騷》篇），衡量諸子的“純粹”與“踳駁”（見《諸子》篇），持論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。對於孟軻荀卿揚雄劉向馬融諸家的多所稱美（見《雜文》《諸子》《體性》《時序》《才略》等篇），以及“石渠論藝，白虎講聚”的一再贊揚（見《論說》《時序》兩篇），也是儒家思想的反映。至於援引經傳和儒家傳統的說法作爲理論依據，或借以證成己說的地方，更是舉不勝舉。所有這些，都是劉勰的儒家思想在《文心雕龍》中的具體表現，我們要探討他的思想，是萬不能忽視的。

照上面的說法，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所表現的思想爲儒家思想，當無疑義。但他究竟屬於儒學的古文學派抑或是今文學派，還得略爲說明。由《序志》篇“敷讀聖旨，莫若注經，而馬鄭諸儒，弘之已精”的話句來玩索，已可知其消息。因爲馬融鄭玄都是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，劉勰對他們那樣恭維，足見他是崇信或傾向古文經學派的。再拿全書來考查，也無不吻合。條述如次：（1）《毛詩大序》

的一些說法，書中多所運用（例多不具舉）；（2）《僞古文尚書》（當時還不知其爲僞）的某些辭句，往往爲其遣辭所祖（例多不具舉）；（3）古文經學家一般不爲章句之學，《論說》篇“通人惡煩，羞學章句”的“通人”，就是指的古文經學而言。在他所舉“要約明暢”的四個範例中，如毛萇孔安國鄭玄都是兩漢的古文經學大師；（4）《史傳》篇對於《左傳》極力推崇；（5）《詩經》的《毛傳》《鄭箋》，書中多本之爲說（例多不具舉）；（6）古文經學家的舊說，間或采用，如《宗經》篇“皇世《三墳》，帝代《五典》”兩句，係用賈逵說（賈說見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《正義》引，《僞孔傳序》也是用的賈逵說），《書記》篇“繞朝贈士會以策”句，也是用的服虔說（服說見《左傳》文公十三年《正義》引）。只此六端，就大可看出劉勰所受古文經學派的影響是很深的。

總之，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所表現的思想爲儒家思想，而且是古文學派的儒家思想。但他的文學觀是否爲唯物的，還不能因此卽遽下論斷，這就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了。

關於劉勰的“三準”論

——與熊先生商榷——

郭味農

最近讀了熊寄細先生題爲《劉勰是怎樣談創作過程的》的文章（見《光明日報》1961年12月17日《文學遺產》）。文中對劉勰的“三準”論作了探討。爲了就正高明，我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，算是參加這個問題的探討。

所謂劉勰的“三準”論，是《文心雕龍·鎔裁》篇中的一段文字。文曰：

思緒初發，辭采苦雜，心非權衡，勢必輕重。是以草創鴻筆，先標三準；履端於始，則設情以位體，舉正於中，則酌事以取類；歸餘於終，則撮辭以舉要。然後舒華布實，獻替節文。繩墨以外，美材既斲，故能首尾圓合，條貫統序。若術不素定，而委心逐辭，異端叢至，駢贅必多。

其中“履端於始”至“撮辭以舉要”六句，爲三準本文。現在再看熊先生的意見。他的意見是：

三準是進入創作之前的準備階段的三個步驟。“設情以位體”是確定主題；“酌事以取類”是選擇題材；“撮辭以舉要”是編寫提綱。

他說：釋《文心雕龍》者對“設情以位體”、“酌事以取類”兩句意義的解釋，基本上沒有多大分歧，而對“撮辭以舉要”的解釋，就不